

# 也谈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

张世民

**提 要：**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产生了历史理论和方志理论两种语境。从区域社会实践到方志编纂实践，从方志哲学更新到方志体裁改造，从方志编纂、方志审定、志鉴管理、史志文献、年鉴编辑、志鉴应用，然后到志鉴发展史的研究，共同构成了方志学的学科体系。又，史志著述若不能打通政治话语与道德话语之间的壁垒，也就难以跨越历史时空，保有著述的持久生命力。尽管道德话语体系的本质，随着不同时代人们对于道德内涵的不同赋予，实质上也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但毕竟，道德话语体系较之政治话语体系，具有更深邃的洞察力和更强烈的表现力。政治话语体系所展现的是一种现实评价，道德话语体系所展现的是一种传统评价，前者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质，后者则具有超越当下牵绊的审美特质。上述两种学科畛域的划分、两种学术话语的甄别和不同学术话语之间的转换，也往往会成为引领社会风尚或社会观念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键词：**历史学 方志学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学科建设

最近，读及李红岩《关于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论及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研究中带有趋势性的一些问题，还讨论到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关系问题等。<sup>①</sup> 这些论述给人以新的启迪，尤其是对方志学一级学科设置给予肯定，很令人鼓舞。但是，对于其所阐释的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仍不敢苟同。笔者曾对史志同源<sup>②</sup>、史志关系<sup>③</sup>等问题多所论列，这里着重探讨史志学科的畛域问题和学科体系问题。由于这一话题牵扯面广，理论难度大，在较短的篇幅内难以阐释清楚，此处仅作初步讨论，供大家批评。

## 一 史志同源与史志理论的内在关联问题

在我看来，在中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中，史志同源，流派纷披，总的特征是枝繁叶茂。涉及史志溯源，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sup>④</sup> 足见这里的“志”重在郊野，也就是关于地方的记载；而这里的“史”重在庙堂，也就是大一统框架下的国史。两者出现的迟早，其实说明了方志与国史的关系，殊无关乎方志学与历史学的源流问题。因为史志同源，所以不存在历史学起源于方志，或者方志学起源于历史的问题。两者虽有各自的记述空间，但却彼此互通，由此才蔚成史学大国。近代以来出现学科分蘖，这与历史学独立化、专业化倾向有关，也与西方史学范式的输入有关。传统史志大都以著录为上，并不过度强调

① 参见李红岩：《关于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浙江方志》2019年第1期。

② 参见张世民：《论史志同源及其他：读〈仓修良探方志〉札记》，《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5期，有删节。足本见《论史志同源》，《方志学散论》，陕西新华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190页。

③ 参见刘清阳、张世民：《论著史与修志》，《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④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20年，第490页。

个性观点，这源于孔子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因为孔子整理儒家经典，所采取的大都是文献整理的办法。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sup>①</sup>，恐怕不单指六经皆史料，而旨在说明文献整理属历史编纂，而非创作经典。唯有《春秋》带有著作性质（孟子说：“《春秋》，天下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sup>②</sup>此即寓褒贬、别善恶的著作用意）。从司马迁、班固开始，纪传体正史的编著立足社会实践，同时承载着稽古论今的著述目的与思想；从荀悦到司马光，编年体历史也在梳理逐年文献的同时，贯穿了著作者治国理政的思想观念；从袁枢到谷应泰，纪事本末体历史更以完形叙事为特征，其著述理念更接近于西方历史著述。倒是王夫之《宋论》和《读通鉴论》，堪称是中国式历史理论的代表作。最早的方志更像编年史，并无大一统框架下的国别史性质。将不同区域文献加以汇总，即构成了从《汉书·地理志》到唐代《元和郡县志》为典范的地情总汇，这也是元明以降国家编纂一统志、总志或通志的历史先导。对于不同社会环境的区域分析，大抵相当于方志理论研究。唯其表现方式，带有探讨区域国情的性质。

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而言，它始终奠基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此前，黑格尔所著《历史哲学》具有历史理论性质，并非历史编纂学。黑格尔强调历史的逻辑演变，也就探讨了历史现象的规律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其著作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同样很少历史编纂学的探讨。19世纪中后期，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领袖，又在社会实践中指导着这一运动的发展进程，他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社会实践，从而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历史理论家，在他们的历史著述中，始终存在着怎样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关系的命题。

在中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上，几乎所有历史著述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编纂理论来展开的。历代学人在撰写历史著述的同时，也在更新着历史编纂学的基本内涵。从孔子肇始，至司马迁、班固、刘知幾、杜佑、郑樵、章学诚等人，都对历史编纂学有过深切的讨论，且在历史著述中加以切实践履。譬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政书体、典志体等著述体裁，都被灵活运用于史志编纂实践。所谓史志同源、史志互通，最大的畛域在于中央和地方、整体与局部之间的时空关系。譬如夏商周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大一统国度和秦汉唐等以军功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度，两者的政权设置均高于地方建置。《太史公书》《汉书》属于大一统政体下的历史著述，故其历史著述被称作“书”；魏蜀吴三国属割据政权，故其历史著述被称作“志”。在中国传统史学看来，与其空谈哲理，不若结合社会实践。进而言之，与其空谈史学理论，不若蔚成历史著述。历史著述的对象是社会实践，而史学理论的对象是怎样记录历史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恒常还以为相对于社会现象的是社会本质，相对于历史现象的便是历史本质。在我看来，历史和社会之间本身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历史记载和社会现象乃是人们的感知和意识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不同体现。因此相对于历史现象的仍将是社会本质，而绝无所谓历史本质的存在。人们总结历史所表明的用心用意，恰恰是人们的主体本质。”<sup>③</sup>换句话说，著作人撰写历史著作，实质上反映的是著作人本身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清代浙东学者，以黄宗羲、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易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② 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四书全译》，中华书局，2020年，第320页。

③ 张世民：《论历史总结》，《江汉论坛》1989年第3期。

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最负盛名。其中章学诚、邵晋涵两人虽则社会际遇不同，但都矢志重编《宋史》。邵晋涵既入四库馆，受命辑佚《旧五代史》<sup>①</sup>，而章学诚人在江湖，甚至无法参编国史，故卸官后全身心投入地方志编纂，这其实也是他践行历史编纂梦的具体实践。

从社会实践到历史理论，以及探究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是所有历史著述都必须掌握的认知步骤。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著述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并不限于历史编纂，但当代中国的历史编纂都必须有所遵循；我国传统历史著述的指导思想，向来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话语体系。道德话语与政治话语密切相关，政治伦理堪称道德伦理的集中表现，但在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传统历史著述大都将道德话语标准置于政治话语标准之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也在于此。整个20世纪，西方历史著述传入中国，其著述特点以实证叙事为主，常常带有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定义，在此著述风气影响下，历史学界更像是用中国的社会现象来论证、来诠释这些基本定义，他们对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援此为鉴，所以借鉴性远远高于独立性（在这里，出现了将西方历史理论作为经典文献来引证、来诠释的史学倾向，这恐怕与传统历史学长期作为经学附庸的诠释思维有关）。当前我国历史理论的实证研究相对薄弱，关键就在于过分固化了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基本定义，而许多学术争鸣都因不符合现行意识形态的学术诉求，而很难有所深化，有所突破。

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中，经学以儒家经典为旨归，相当于中华民族文化轴心时代的思想智库，而历史学从阐释经学到相对独立，也有其日益深化、逐渐覆盖的演变过程。从史志同源到史志分野，也就昭示了这一经世学术走向分化、迈向独立的必然趋势。历史书作为国情文献，为历代国家治理所必重；而志书作为地方文献，又是区域治理的不二宝典。“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即揭示了这一大国治理的规律性。就当代而言，当代史以党史、新中国史为主，当代方志以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均由各级党委、政府来组织实施。尽管方志学尚未纳入普通高等院校专业学科范畴，投身此一事业的专家学者还相当稀缺，但历来高等院校始终不乏研究区域问题、活化利用志鉴资源的专家学者，问题仅仅在于，有限的研究者探讨旧志的热情比研究新志更浓郁。究竟怎样更好地解决当代方志学学科建设这一瓶颈问题，亟待引起学术界的深切关注。

## 二 历史学和方志学的学科畛域问题

在中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中，历代国史和地方志是生长在同一棵参天大树上的不同枝干，包容性大、涉及面广，是其他各类著述所无法替代的。从历史角度看，历代正史、编年史，甚至野史构成了史书序列，实录、起居注属于朝廷编年，而后代修前朝史，也寝假蔚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传统。与此同时，从地方角度或行业角度看，全国性一统志、总志或区域性通志，以及各地方志、行业志，甚至家牒、族谱之类构成了志书序列，而当代人修当代志，在地方志书基础上增之以地方综合年鉴，更让方志著述的学科规模巍然崛起。我国古代社会有三百六十行的划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便是我国古代的国家行业分类标准。我国当代国

<sup>①</sup> 参见金毓黻：《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大抵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内在变化，每10年左右调整一次，其中既借鉴了联合国通用行业分类标准，同时又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像历史理论奠基于国家或地方的历史分析，重在强调社会性质和社会演变的规律性探索，亟须丰富其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一级学科内涵那样，方志理论作为对基本地情的专项分析，重在强调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对其独立的一级学科设置也有必要给予保障。我国现行学科分类体系中属于历史学科的有两个一级学科（历史学、考古学）<sup>①</sup>，普通高等院校历史学类有8个专业（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文化遗产、古文字学）<sup>②</sup>，均有必要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进。其中，方志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科，旨在为治国理政中的区域发展提供借鉴，亟应从历史学科中专门史的一种提升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中与历史学、考古学并列的一级学科，同时纳入普通高等院校教育的专业学科目录。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西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强势东渐，近代以来我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也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现象。一部分主干学科被直接采撷过来，纳入了西化学科体系的范畴，而一部分主干学科被任意切割，甚至弃置不用。现在所畅行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正是这种任性切割的结果。譬如在中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上，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向来密不可分，但也出现了新的裂变。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可知，地理科学类全部归入理学，包括地理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4个专业，完全抛弃了与历史学学科边缘交叉的模糊内涵。而历史地理学的诞生，既有来自西方的学术脉络，又有来自传统沿革地理的学术脉络，这一边缘学科从草创到独立，从侧重文献到田野考察，又堪称是中国传统史志资源的现实应用。无论是国家、地方历史地图集的编写，还是自然历史地理、军事历史地理、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历史地理等等学科分蘖，其实都是源于史志基础而展开的应用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地理学更像是历史应用学或方志应用学的一部分。

站在今天的学科体系来看，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学科畛域仍然处于不断调适之中。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中，向来没有方志学的学科位置，但这不等于西方没有区域研究。西方不强调国家大一统，尽管欧美各国也都在走向经济共同体，但他们对于经济共同体的研究，并不是通过历史编纂的方式来实现。我国传统历史学的发展肇始于大一统国家的诞生进程，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各种编年体、纪传体史书的勃兴，与当时国体、政体的确立有直接关联，两千多年来具有中央集权特征的历史发展，也与这一历史著述传统密切相关。站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中，历史学领域是相当受限的，而站在中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中，历史学领域更加辽阔，更加广泛。对于这一传统历史学遗产，我们有必要加以继承和发展。那么，究竟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历史学遗产？可以肯定，继续沿袭过去未予分蘖的浑沌空间，坚持史志一体化，恐怕并不可取。要明晰这一传统历史学遗产，首先就要进行必要的学科分蘖，而且不只是边缘学科越分越细，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相结合方面同样需要进行学科畛域划分。换句话说，在庞大的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谱系中，要将方志学的学科畛域加以拓宽，就有必要在历

① 参见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92）。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其中历史学门类下设专业类1个，包括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4个专业，特设文物保护技术、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2个专业。2015年增入文化遗产专业，2021年增入古文字学专业。

史学学科的侧畔,进一步提升方志学学科的独立位置。李红岩强调,“方志恰恰是为历史学这座大厦培植根本、培植基础的一门学科。”<sup>①</sup>如果这样定义方志学的学科地位,就难以超越“志者,史之翼也”<sup>②</sup>的传统观念,方志学作为历史学附庸的地位就无法彻底改变。在我看来,将历史学、方志学并列设置为一级学科,赋予两者不同的学术空间和研究使命,其实是为了进一步凸显中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的特色内涵,更加充实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谱系的基础构成,而不光是专业学科分蘖的问题。历史学固然有全球史、国别史、地方史、专题史、思想史、民族史等不同主干,方志学同样有一统志或总志、通志、区域志、行业志等等重要分支,甚至在对于国别问题的认识上,方志学的学科视角也是完全可取的。清末民初,随着中国国门的对外开放,许多外交官使用方志体裁来记录所在国国情,譬如黄遵宪撰《日本国志》,慕维廉辑《法兰西志》《英吉利志》等,其实都是运用志学视角认识异国国情的一种典型示范。

在史志学科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实践和社会问题,方志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区域社会实践和区域社会问题,两者在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有所互动,指导思想上也彼此兼容,但是两者的学科畛域划分,仍然有助于研究领域的专门化、精深化和系统化。相对而言,历史著述相对普适、相对宽泛一些,其意识形态属性更加突出;方志著述相对专精、局限一些,但同样存在意识形态属性:两种著述的共同特点,在于著作体裁的多样性、兼容性。同一道理,历史理论属于宏观思维,方志理论属于微观思维,两者的共同空间乃在于跨越时空的中观思维。换言之,也就是要寻找适合当前社会语境下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命题。从区域社会实践到方志编纂实践,从方志哲学(又称方志学概论)更新到方志体裁改造,从方志编纂、方志审定(或称方志批评)、志鉴管理、史志文献、年鉴编辑、志鉴应用,然后到志鉴发展史的研究,共同构成了方志学的学科体系。<sup>③</sup>

站在学术体系的立场来看,历史著述的学术体系和方志著述的学术体系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差异。从体裁上说,历史著述强调竖排竖写,而方志著述强调横排竖写,前者始终贯穿着历史性,编年叙事列在第一位,后者坚持捍卫着逻辑性,部类划分居于第一位;两者都强调历史性和逻辑性的统一,这也是其共同的地方。就层级而言,方志著述的层级容易廓清,国家一统志或总志、通志可兼容较高层级的地方,省、市、县级志书可兼容较低层级的地方,而乡镇志或行业志则重在基层,这是方志著述的学科层级(尽管兼容作用是有限的,梁启超即说,各级志书“各自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可成,府县志非割裂省志可成”<sup>④</sup>);历史书的层级相对复杂,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掌故等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而这个历史时空不可扁平化,也缺乏延时性,故而历史著述必须从基础写起,从细节写起,反映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演变始末。史志关系绝非纯粹的原始史料与著述成品的关系,也不是述而不作或述而有作,因为就整个学术体系来看,两者的差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假如说方志著述堪称历史著述的原始资料,那么历史著述也无妨作为方志著述的撰写背景,两者的互动空间大可不必从主从学

① 李红岩:《关于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浙江方志》2019年第1期。

② 孔闻诗:《重修曲阜县志序》。原话:“志者,史之翼也。《周礼》小史掌四方之志,而上之五府,太史得以总其成。则志之与史,一经一纬,错而成文,体殊义一,不可误也。”

③ 参见张世民:《论学科建设》,《方志学散论》,第196—206页。又,《略论地方志的学术理念和话语空间》,《方志学散论》,第631—640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98页。

科的角度来加以切割。方志学作为研究方志编纂实践的专门学科，既有方志理论的层面，更有方志学理论的层面，后者是对研究工具、方法的深入探究，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就方志学理论基础而言，就包括方志编纂理论、方志审稿理论、方志应用理论等，其中方志编纂与历史编纂产生了共同的历史哲学，方志审稿与历史批评产生了共鸣的审视思维，方志应用与历史应用产生了共享的应用思维。这些内容的核心在于对基本国情的基础认知，由此构成了方志学的基础学术体系。

就方志学话语体系而言，主要涉及反映特定社会存在的特定范畴、概念，这也就是方志学的分类逻辑和话语范畴。地方志的部类划分、话语方式，要求以客观叙述为主，不必强行主观论列。要科学运用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而不必照搬西方的学术话语。因为西方的学术话语，无法精准阐释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适当调适是完全必要的。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与历史学学术话语体系有明显差异，尽管从传统经史学术谱系而言，两者可以互动互通，但在当代学科门类分蘖日渐精细的情况下，两者的具体言说范围、言说范畴和言说概念，特别是两种学术话语体系的实际差异和彼此转换还是非常明显的。站在今天的学术话语体系角度来看，历史著述的学术话语体系带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尤其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都带有为国家立言、为民族立言、为政党立言等庄严政治使命；夹叙夹议、寓论于述，甚至以论代史，述论结合，都是司空见惯的。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总是通过“太史公曰”“臣光曰”发表其治国理政的言论。<sup>①</sup>方志著述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譬如明代嘉靖《陕西通志》有大量“雍人曰”，也都是展现其学术话语立场的史评政论。<sup>②</sup>又如从明代理学家吕柟到清末民初理学家白遇道，两种《高陵县志》的共同特点，就在于贯通运用关中理学作为编纂指导，集中体现了编著者所在时代的治县理政思维。<sup>③</sup>在我看来，“方志学学科语范的建设，既要注意吸纳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精髓，又要重视重建在现实社会基础之上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语态”<sup>④</sup>。

对于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学科畛域和异同分析，从史志同源论到史志异同论，传统史志学界有过激烈的学术争鸣，当代史志学界的讨论更加深入。历史地理学者谭其骧、史念海，史学史学者金毓黻、仓修良，方志学者梁滨久、陈泽泓、赵庚奇，历史学者李红岩等人，均有过专门讨论。

历史地理学历来是地方志资源的最大用户。其奠基人之一谭其骧区别了史与志的关系，却未甄别志体和史体的关系。他主张：“地方史和地方志同样以一个地区为叙述对象，二者关系极为密切，但史和志不能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应该“把总志和方志混为一谈”，强调“凡是以全国为对象记载的，那就不能叫地方志”，这个观点是片面的、不周全的。<sup>⑤</sup>事实上，凡是采用志体来表述的著述文献，均应括入志书的范畴。由此可见，谭其骧着重从记载层级上区别了史志之

① 参见张世民：《论历史应用学的建立》，《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

② 参见张世民：《关学大师马理及其〈陕西通志〉》，《陕西史志》1996年第4期。

③ 参见张世民：《关中理学与史志关系的典型例证：高陵县续志》，《华夏文化》2020年第2期；《关中理学与史志关系的典型例证：写在〈高陵县续志〉书前》，程维雍监修、白遇道总纂：清光绪《高陵县续志》，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6页。

④ 张世民：《试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西安地方志》2013年第2期。

⑤ 参见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合刊；《地方志与总志及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5期合刊。

间的学术畛域。另一位奠基人史念海则从方志的源流演变角度探究了清代学者章学诚和戴震所肇端的史志关系争议。他强调：“现在的史与志的关系，乃是以史贯穿志，这里说的志应该包括自然演变的记载和社会现象的记载。……如此纵横交错，史和志的关系就可以体现出来。换句话说，一部方志中实际上就将包括若干具体的史，如河流演变史，气候演变史等，如同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体，每一现象，无论其为自然的，或者社会的，从头至尾，源源本本，举出规律，交代清楚，这样可以有裨于应用，才可以称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方志。”<sup>①</sup> 这着重从记载内容上对史志关系作出了学术甄别。

隋唐以来，历代《经籍志》或《艺文志》，大都将方志列入史部地理类，章学诚始将其纳入别史范畴。作为史学史专家，金毓黻肯定了史志同体的观点。他强调：“盖国史与方志，本为同条共贯之书，不过一记国家之事，一记地方之事，范围有广狭之殊，而同属于史，则无疑义。”<sup>②</sup> 与此相反，仓修良则大大强化了史志差异。他主张严格区别地方史与地方志，并认为方志导源于地记、图经，其策源时间在两汉时期，较之历史学要晚一些。但在《仓修良探方志》一书中，他又反复引证《左传》7条原始文献，旨在说明“《左传》所载之‘志’，均是指古书、古史而言”<sup>③</sup>。事实上，却又将史志概念联系起来。

作为地方志学者，梁滨久辨析史书和志书之间的关系，并以阐述或者反映客观规律性来区别，以经纬纵横的颠倒表述来定位，以叙述历史过程抑或叙述历史过程主体来区别，貌似有理，终难甄别。他同时强调史志结合，甚至赞成史志合一，则又将史志融为一体。<sup>④</sup> 陈泽泓不同意将竖写、横分竖写看作史志体例的主要区别，而是从史志体例特征出发来进行区别。<sup>⑤</sup> 赵庚奇从体例结构、内容详略、社会功能和具体写法上区别了史志关系，唯其史以通史为例，志以方志为例，均非典型体裁。<sup>⑥</sup> 事实上，通史与通志、地方史与地方志，既各有体裁结构，又有不同话语空间。

作为有代表性的史学学者，李红岩肯定“历史学来源于方志”。他强调，史学家不仅记录，还能通古今之变，能够成一家之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一切著述都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历史著作要在学术市场中经受严格的考验，大量的史学书籍要被淘汰掉。而方志是记录，不是著述；编纂方志是国家行为，体现国家意志；方志是记录，且记录高于著述；志书很难被淘汰；即使修得不好，也将留下基础性史料。<sup>⑦</sup> 值得肯定的是，他支持国家将方志学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一级学科来设置。但同时又将其作为历史学的资料基础，而不明晰其独立位置。

上述不同界别学者关于史志关系的学术争鸣，为我们区别史志关系、廓清史志畛域，提供了殊可宝贵的意见。从方志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来看，各家观点都是站在其专业立场上所表达，都不无合理的内核，但都不够全面、系统，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科学扬弃的地方。

①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

③ 仓修良：《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7页。

④ 参见梁滨久：《史志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4期。

⑤ 参见陈泽泓：《史志体例区别浅析》，《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2期。

⑥ 参见赵庚奇：《试论史志区别的四个问题》，《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3期。

⑦ 参见李红岩：《关于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浙江方志》2019年第1期。

### 三 两种学术话语体系的甄别问题

章学诚主张志属史体。他强调，历代的图经相当于地理书，而方志的编纂目的，却在于供国史取材。如此看来，其对史志体裁的定义，仍然站在中国传统经史学术谱系之上，其历史学与方志学观念彼此纠结，无法切割。倘若肯定了章氏的史志观念而不划清史志畛域，那就只能定义其为历史学家而非方志学家。如此一来，梁启超关于章学诚作为方志学创始人的说法<sup>①</sup>，也就站不住脚。梁启超指出：“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骋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清代中叶，戴震强调地方志的地理属性，章学诚强调地方志的历史属性，两个观点彼此对立，却也相互补充。就地方志而言，其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兼而有之，关键在于时空畛域上的差异性。换句话说，地方志以地方或行业为对象，可以兼用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双重视角，但在时空畛域上，两者的差异性还是非常突出的。

谈及总志与方志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首先强调“志体”的学术贯通性，不要轻易将一统志、总志和通志从方志体裁中割裂出去。同时，要保障志体著述的可持续性，从上而下的修志机构建设也是必须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章学诚曾强调设置志科的现实必要性，认为国家层面设置史官，可以反映国史，编写实录、起居注，汇总各地志书蔚成一统志、总志和通志等，这属于国家层面的学术架构。站在地方层面，地方志、地方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情文献，都是不同层级志科的职责。在一定意义上说，志科或与政府修志机构或档案机构的合并设置，甚且有助于地方文献的系统征集、综合保存与开发利用。一方面，志科与吏、户、礼、兵、刑、工等行政衙门并行，具有官署机构的性质；另一方面，志科作为执掌地方文献的机构，又具有社会分工向学科分工转换的特点。志科的学科性质，与国家层面的历史研究机构，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就当代而言，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大抵整合了国家层面的历史研究机构，而整合历史研究机构的目的是，应该重在历史理论研究和历史编纂实践，主动承担起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编纂任务。对于当代国史的研究，属于中国历史研究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代区域社会的研究，也应该纳入这一研究机构的整合范围。可以肯定，成立这一区域研究机构的直接目的，既是跟进并研究当代国史，同时也将通过国史编纂实践，直接推动当代史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当代党史、新中国史和地方志的彼此互动，也将是史志著述互动增益、相互支持的一个标志。

有人强调史志关系，认为史有议论，而志不议论。<sup>②</sup>用是否有所议论、有所褒贬划分史志的学术畛域，这个观点同样是不可取的。还有人用葡萄和葡萄酒来比喻史志关系，认为方志著述像葡萄，历史著述像葡萄酒，两者的差异在于是否经过了精心酿造。在我看来，这个比喻仍然不够精准（倘若用这组关系来比喻资料与著述的关系尚可，但史志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书未尝不可以资料为主，而地方志的著述性又不容低估，若是志书以史书为资料基础，用葡萄和葡萄酒的关系来颠倒比喻，恐怕也照样适用。具体而言，历史著述可以直接评论，也可以寓议于述，顾炎武《日知录》对《史记》笔法的肯定，就强调了这一点。与此

<sup>①</sup>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20年，第495页。原话是：“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sup>②</sup> 参见朱佳木：《地方志工作要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期。

同时，方志著述可以有所议论，也可以夹叙夹议，甚至旁敲侧击。不管是地方志还是历史书，大抵都拥有直接评论、夹叙夹议和间接评论、寓评于述等著述手法，其著述性的落脚点也就体现于此。<sup>①</sup>谈及史志作品的著述性，归根结底，要看作者立足现实的意识形态属性。传统历史学更强调道德话语体系下的系统观念，牢牢掌控着道德话语的最后评鹭权，这也是其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基础。

最后需要强调的，还有经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经学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学说，而历史学原来依附于经学，历史著述次生于儒学经典，甚至它属于编纂还是著作，取决于它贯彻经典思想的方式方法，随着经典文献的历史变化，历史学才逐步成长为一门独立的主干学科。传统学术界认为“史者，经之翼也”<sup>②</sup>，就是将其当作儒家经典的说明书，视为学以载道的工具书，最关键的就是令其成为捍卫道德话语体系的核心载体。当代中国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倘若不以相应的道德话语体系为基础，而完全以政治话语体系为基础，就很容易使历史著述成为现行政策的解读，地方志书也不例外。20世纪60年代初，有关历史学的学术争鸣中，翦伯赞就批评过用现行政策替代历史观念的现象。<sup>③</sup>不少地方志书缺乏足够的历史沉淀或学术钩沉，往往以当下意识形态来进行历史记录，其援用现行政策来诠释社会现象的做法更加突出。“对于史志编纂来说，要想解决资料芜杂问题，就必须通过学术沉淀；而对于史志编写来说，为了提高志书的学术质量，必要的学术钩沉更是重要的学术命题。”<sup>④</sup>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史志著述基础受制，且不能拨冗去繁，激浊扬清，进而凿通政治话语与道德话语之间的壁垒，也就难以跨越历史时空，保有著述的持久生命力。李红岩指出所谓“很多史学著作，将会被时间所抛弃，而大部分方志不会被时间所抛弃”<sup>⑤</sup>，恐怕正缘于此。尽管使用道德话语体系的基本形态，随着不同时代人们对于道德内涵的具体赋予，实质上也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但毕竟地，道德话语体系较之政治话语体系具有更深邃的洞察力和更强烈的表现力。政治话语体系所展现的是一种现实评价，道德话语体系所展现的是一种传统评价，前者具有功利性质，后者则具有审美特质，审美视角较之功利约束更加持久，更具影响力。“对历史学家来说，直接作用的现实世界和间接影响的传统世界相互交参，彼此转化，都必须建立在创造性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sup>⑥</sup>所以上述两种学科畛域的划分、两种学术体系的甄别和不同学术话语之间的转换，也往往会成为引领社会风尚或社会观念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者单位：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全

① 参见刘清阳、张世民：《论著史与修志》，《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② 张自勋：《纲目续麟》，《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二》。其原话是：“士必通经，而后可以学史。史者，经之翼也。经不明则权衡轻重，莫适主焉。”

③ 参见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2页。其原话是：“正象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政策推行于外国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今天的政策推行于古代。”

④ 张世民：《略论志鉴著述的学术沉淀问题》，《陕西地方志》2018年第2期。

⑤ 李红岩：《关于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浙江方志》2019年第1期。

⑥ 张世民：《论历史世界》，《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